

### 第三章 鄧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文革十年，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動盪與不安，毛式民族主義的論調帶給中國的似乎是災難大於收穫。待毛一死，其接班人華國鋒上台立即將四人幫逮捕，予人革新圖治的氣象；豈知華國鋒後來宣稱「兩個凡是」，<sup>1</sup>整個政府的運作步調幾又轉回毛的中心思想原則，如此一來，讓曾經三上三下的鄧小平抓住機會，<sup>2</sup>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獲取多數人的支持，並在往後的六中全會、甚至是十二大中出盡鋒頭，將華氏徹底拉下馬。

基本上，鄧小平主政時期下的中共，是秉持著獨立自主的精神以進行一連串的改革活動。這段期間之中，鄧有效的將毛澤東統治後期所造成的紊亂狀況翻轉過來，利用的是更切合當時中國現實狀況的理論與政策。一般說來，論者在探討毛澤東理論的基本內涵時，大都認為其包含兩種性質——實踐性與理想性。由於其後期理論的大躍進，或說是理想性中的烏托邦性質大爆發，造成中國內部的動盪不安。毛利用了民族主義的情緒，激發民眾的衝勁與服從性質，試圖打破長久以來的窠臼與落伍封建思想，我們不能輕易斷言他是失敗的，但至少是帶給中國一定程度的打擊。

<sup>1</sup> 「兩個凡是」，由華國鋒在 1976 年最先提出的，他提到，凡毛主席批准過的、講過的不能批；在 1977 年，他在發表了「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後即歸納為「兩個凡是」。請參閱，李谷城編，**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273~275；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頁 875~877。

<sup>2</sup> 鄧小平在中共黨史中，曾經三下三上。第一次是在 30 年代初期中央蘇區時，由於以博古為代表的中央臨時政府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等人則堅決反對他們的「城市中心論」。為此，鄧小平遭批鬥，並一度被關進監獄，他的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和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也被撤銷，並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處分，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這次落起才畫上句號；鄧小平第二次起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文革」初期，鄧小平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連，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改造。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時期。1973 年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得以恢復。1975 年初鄧小平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並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第三次則是在 1976 年至 1977 年。鄧小平因全面整頓「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發生，違背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四人幫」與毛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 1977 年 7 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才獲得第三次上台的機會。詳見，趙曉光，劉杰，**鄧小平三落三起**（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韓文甫，**鄧小平傳(上)(革命篇)**（台北：時報，1993）。

相對於毛，鄧小平在重新回到權力場域之後，不再強調階級鬥爭，反而提出以「生產力優先」的政策中心指導方針，他將「兩個凡是」看做是對毛澤東「實事求是」的逆襲，1977年時，他就對「兩個凡是」做了批評：

「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sup>3</sup>

透過「實踐檢驗真理大辯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擊敗了「凡是派」，<sup>4</sup>企圖將時空拉回至中共八大之前的穩步前進狀態，或是中共與毛澤東早期宣稱的社會主義初級狀態，以求國內民生經濟發展的重建與再生，強化中共的競爭力。此外，中共也因為在1980年正式與美國建交，更加擴大其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交往互動，與文革期間接近鎖國的狀態有極大的不同；也就是因為與西方的互動開放，使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與理論也陸續衝進中國這個塵封已久的大國。

鄧小平面對西方世界強力影響力的入侵，亦開始緊縮曾經風光一時，或甚至曾經是鄧小平盟友的民主運動與民主人士，他陸續提出包括「四項基本堅持」、「反精神污染」等論述，從中國的內部國情與民族特性出發，將西方的自由民主風潮之影響力壓至最低，一般人民大眾也因為都還有著毛時期政治運動頻仍所遺留下的恐懼感，因此對於民主自由運動亦無太多有力的支持與回應，這是毛時期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但也因此成為鄧小平施政的利器。

而鄧個人獨特的革命經驗，也影響到他更加著重實際情況的發展。他捨棄文

<sup>3</sup> 鄧小平，「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8-39。

<sup>4</sup>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117-119。

革與毛晚年所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取而以發展生產力代之，將重心回歸到經濟與社會層面的發展，將不必要的、紛雜的政治權力拼搏暫時的隱蔽；當然，這樣的做法不代表鄧就毫無權力的慾望，他依舊力求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當他遇到種種的困難與問題時，他還是回到了老長官毛澤東的懷抱之中，將疑難訴諸、上升到民族問題的層次，再次強調中國/西方的差異性，以弭平開放之後可能造成的不良結果。

往後，鄧小平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對於政治方面要求開放的聲浪卻更形緊縮，一如毛澤東，鄧在面對西方世界的影響時，仍堅持強調中國、中國人的主體性與獨特性，甚至優越性，企圖保持西方世界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代表的面貌，使中國能夠藉由民族主義這塊防護網，抵禦外國勢力的影響。在這樣一種既開放又保守的雙重作用下，中共面臨到許多的新課題，同時，也有一些隱藏許久的陳年問題漸漸浮出檯面，等待鄧小平及其他領導人加以面對與解決。

## 第一節 開放論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毛死後，華國鋒雖然表面上掌握黨政軍大權，又將在文革中得勢的四人幫予以逮捕瓦解，看似將有一番不同於毛時期的作為產生，社會上相對的也出現許多期待的聲音；但，隨著 1977 年他在兩報一刊上發表著名的「兩個凡是」，對毛澤東晚期造成的錯誤忽略不提，反倒持續將毛澤東的作為與指示奉為圭臬，這不單是在一般民眾心中，甚至中共黨內許多幹部都產生不滿。再者，華氏並沒有良好顯赫的「過去」，因此也難以服眾人，這一來一往，使得鄧小平掌握契機，先在十屆十中全會上復出，爾後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獲全勝。<sup>5</sup>

其實，鄧小平之所以能夠順利的重出江湖，甚至坐上中共領導人的位置，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清楚的了解到「現實狀況」，亦即，他知道這時候社會上的風

---

<sup>5</sup>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 99~100。

向，最主要的是要擺脫毛後期所製造、帶來的不安與混亂，所以，當華國鋒一派仍抓著已故的毛的遺產之時，鄧小平巧妙的運用了毛澤東的思想來打擊華國鋒，也就是用「實踐」、用身體「力行」來打擊華將毛的個別論斷當成基本原理的錯誤。

6

鄧小平看準時勢的重要作為，就是揭示了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點。基本上，毛時期也曾提到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課題，但因為八大後中共路線的躁進，使得類似的討論漸不受重視。鄧在第三度上台且掌政之後，決心將態勢往現實層面拉近，不但重申「四個現代化」，<sup>7</sup>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中共社會內部仍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隨後在十二大、十三大的報告中亦陸續對中共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狀況作更清晰的界定。<sup>8</sup>

在此同時，由於中共適度的對外開放，勢必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有更多的交流互動機會，也更容易接觸吸收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鄧與華爭權時，鄧與民主派人士的適度結盟與合作，亦影響了鄧華之間地位權力的消長。很重要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各層面適度運用資本主義的邏輯與方法，應可以獲得理解與認同或甚至是無可厚非的選擇，但，中共內部領導人對於資本主義的行事邏輯存有疑慮，甚至害怕將會影響到中共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因此很快的就對曾經風靡一時的民主運動展開打擊作業，一定程度的影響了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國的發展。

<sup>6</sup>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 100~101。

<sup>7</sup> 「四個現代化」，最早由周恩來所提出，包括工業、農業、交通運輸與國防的現代化；到 1963 年周恩來將四項現代化修正為工業、農業、科技與國防的現代化概念。爾後經過文革期間的停擺，時至 1977 年中共十一大才又將四項現代化重提並宣稱其為新歷史時期的總任務。請參閱，周恩來，「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載於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一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412~416；周恩來，「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載於周恩來，前揭書，頁 479。另，鄧小平在 1978 年的全國科技大會上，強調科技發展現代化的重要性以及將知識份子納入勞動階級之中，詳見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85~100。

<sup>8</sup> 趙家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20~21。

其實，整個鄧小平時期中共的統治模式，是依附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下的，其內涵包括「不把教條當真理，凡是以實踐為先」、「以基本國情為依歸」、以「發展生產力」、「經濟發展」為中心、以及「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sup>9</sup>很清楚的，這種「中國特色」與「兩個凡是」的論爭，使得時光似乎又退回到毛澤東與國際派在延安時期競逐的年代，只是主角換成鄧小平與保守勢力的拼搏。

鄧小平與中共在 1982 年的十二大上，首次全面揭示了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述：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sup>10</sup>

從鄧小平的開幕辭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提到了「中國實際」、「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在毛與國際派鬥爭時似乎就已提出的論點。同樣的論點，在相隔了三、四十年之後再度被提出，一方面，可以說中共一再的老調重談；另一方面，則顯示出中共在這數十年間在經濟建設與政治改革的努力與工作成效不大，使得鄧小平與中共必須重新回歸到最初的、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從最簡單樸素的論點出發，試圖將中國從文革中的殘破景象做逐步的提升。

在這種兩造互相拼鬥的過程中，宣稱從「中國國情」出發的一方，往往都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從政治層面來看，獲勝者都清楚的了解當時人心的主要走向；

---

<sup>9</sup>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9500.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9500.htm)

<sup>10</sup>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2~3。

藉由這種標語式論述的產生，最重要的是具有簡單明瞭的效用，使民眾可以清楚的了解政府政策作為與預期走向，儘管實際來說，一般人民大眾仍不了解政府運作的方式，但至少宣導層面上，起到了有利的宣傳功效。

這種從本土、從實際情況出發的現象與聲明，雖然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個別出現，但基本上仍有其相似處存在。鄧小平時期所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管是不是就是資本主義、或真的是社會主義的變種，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提出了「中國特色」。在當時，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從文革的破碎中走出才短短幾年，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與各種政治經濟的衝擊就陸續進入中國大陸，對於掌政的共產黨而言，是想避免卻又必須面對的課題。

有鑒於此，中共乃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項口號，力求在社會主義的大框架底下，進行經濟層面的改革。在鄧小平與中共追求重新出發的這段期間之中，中共宣稱 57 年之前的毛澤東思想與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而 57 年之後的思想與政策則有較多的問題，同時也提到共產黨因為統治的經驗不足，而犯了一些「主觀主義」的錯誤。<sup>11</sup>會有上述的論述產生，是歸因於鄧小平以及中共當時的領導階層必須有效且有力的與文革期間的掌權派脫鉤，且勢必得要將毛澤東的一生做符合當時狀況的切割，以使其往後的施政與作為具有較大的合法性。

基本上，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毛的論述創造出一種屬於「中國特有」的馬列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與特色相加結合，使其更廣為一般大眾與知識份子所接

---

<sup>11</sup> 「關於建黨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文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將毛澤東的功過做一個歷史的定位，並將毛澤東思想定位為領導眾人的集體智慧結晶，請參閱，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 14~15。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750~752。

受與認可，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相對的，鄧小平的論述則試圖強化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合法性，將毛晚期的治理錯誤做有效的切割，把中國的發展現況回歸至「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再者，他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市場機制帶入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試圖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新型的「文化」，一種新的「傳統」焉然而生。

同樣的，鄧小平的論述，也是一種再生產機制下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布迪厄的論點認為，統治階級會複製與創新統治的模式、意識形態等內容使其能夠統治的更加順利；雖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鄧與毛分別在不同時間點、不同發展情況底下做出的論述，但其中都隱含著讓統治階級能夠有效統治的概念。在此要強調的是，這種為了方便統治的觀點，只是鄧與毛考量的眾多因素之一，許多論者會認為統治者會基於某種原因而做出某種行為，但實際上，要有單一因果的情形發生是極其困難之事，因此，本文在此必須特別強調這項觀點，以免讓人有單一因果決定論之感。

其實，所謂「中國特色」，就如前述，是以中國的實際作為中心價值。這當中強調了「特殊性」，根據中共內部較為籠統但普遍的解釋，社會主義從來不存在一成不變的適合於各種歷史條件和各個民族的具體方案、具體模式。它的根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必須根據各個國家的現實條件，帶有各個國家的特色。因此，「中國特色」應當可以被認知為：根據中國特殊現實情況，搭配中國「傳統」文化，甚至透過與外在環境的激盪，所形成的專屬於中國的個體風格。

當然，這種所謂的「中國特色」、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中國而言，到底是會造成一種解殖的情況，還是會加深中國內部的內在殖民，實際上仍有很多爭議。基本上，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這個概念隱含了兩個意義：(一)當時的狀況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完全自資本主

義的路線脫離，而是要搭配資本主義，並且認為要單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難以達成的；(二)要以資本主義為槓桿，才能夠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sup>12</sup>從這種觀點可以看到，中共本身在如何看待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間的關係，已經體認到彼此間互相証成的重要性，更可以看出中國在某種層面上已逐漸走出類殖民的陰影，踏出解殖的第一步。

雖然鄧小平極力撇清其與文革的關聯，不過，在他的論述中我們依稀可見文革時期民族主義的脈落存在。如同前章所言，文革中的中共與毛澤東，是同時高舉世界主義與鎖國的民族主義兩面旗幟的，是兩種看似矛盾卻又可以相加結合的混合型論述；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述底下，所包含的「獨立自主」、「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等概念，亦有相當程度的鎖國意味存在；然而，中共發動「懲越戰爭」，企圖在第三世界與共產國家中仍處於中心之地位，這又是某種類似文革期間中共所展現的「世界主義」心態。

鄧有效的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邏輯，中共宣稱它是一套總結了中共歷史發展經驗與結合他國革命經驗所綜合而成；並且結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同時具備繼承與發展的概念。<sup>13</sup>基本上，這樣的一套邏輯思維，是在中共的「國家主義」態勢持續發展底下與民族主義概念所結合而出的，事實上，<sup>14</sup>這樣一種從國家角度出發的民族主義形式，在中國內部是一種具有「黨國合一」的民族主義型態，因為中共將國家的利益與黨的利益並重，中共與「中國」變成休戚與共，同生共存的連體嬰。

我們可以這樣說，那就是鄧小平身為中共革命的元老，從毛澤東時期開始他

---

<sup>12</sup>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頁 158。

<sup>13</sup>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主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 22~23。

<sup>14</sup>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1999)，頁 78~79。

就親身參與了許多重要政策、論述的制定與鋪陳工作，因此，當他看到毛後期以一種近乎全盤打破的方式，力求中國快速的消除西方文化的制約、並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夢想破滅之後，鄧適時的以他的務實性格，發展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述，從中可以看出他力求與毛時期做有效切割的努力，而他確實也在經濟改革上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鄧小平成功推動改革的另一項因素，在於他與毛一樣，善於將複雜的概念用簡單的話語介紹；以致於或許他沒有毛那樣令人血脈噴張的領袖性格，但依舊能夠順利開展了改革的工作。這樣一種將複雜的改革計畫，用淺顯易懂的話語帶過之手法，很輕易的讓人民接受與認知，一般人或許也不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意義、或根本不懂什麼是社會主義，但鄧小平用貓論、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等簡單的幾句話，就讓人民大眾了解他要做什麼，或他所強調的重點為何。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雖然鄧小平試圖切割毛澤東在新時期的影響力，但其已經在與毛長期的共事過程中被毛影響與制約了。他雖然追求改革，但仍舊強調民族的主體性，以一種開放的保護主義或保護的開放主義進行改革工作，中華民族的特點與主體位置，還是他一貫所著重的重心與強調的課題。為了持續維護民族獨立性的存有，鄧也進一步發展出其他的政策與論述建構，以避免改革開放帶來太多西方的勢力介入，使中國再次受到西方的制約或侵犯。

## 第二節 緊縮評論：「四項堅持」到「反和平演變」

基本上，鄧小平在他掌政的這段期間內，仍努力在區隔我/他之間的差異，特別是當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藉由改革開放之便陸續傳入中國後，使得社會上掀起了幾次的民主化浪潮，這使得鄧小平體認到絕不能夠放的太鬆的道理，否則說不定會有類似雙百運動產生的反效果出現。也因此，他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對於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掌握可說是愈加緊繃。

中共利用其政權的穩固，不斷的提出關於服從黨領導等相關概念的口號及學習講話，利用黨在憲法中的永久執政角色，以有形與無形的方式強壓至人民身上，迫使人民接受，造成一種表面上以民族主義為口號，實際上是隱藏著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為後盾的行為，這種情況類似於往昔被列強欺壓的時期、殖民的事實。唯一的不同點在於，舊日的殖民，主要的殖民者是由外部來的，而現今的殖民者，則是中國人殖民中國人。根據法農(Frantz Fanon)的說法，這種情況就是如同一殖民國內的民族主義者在驅逐了殖民統治者後，又要求國內回復到一種「傳統」的束縛，忽略了被殖民期間所獲得的歷史經驗，將歷史切斷分割，這幾乎造成一種文化民粹主義，同時是一種內在殖民力量的展現。<sup>15</sup>

鄧小平時期所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上似乎與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其類似之處，都是以「中國傳統」、「中國文化」作為論述的背景，即使這些所謂的「傳統文化」也可能只是被「創造」出來的，但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不過，實際上，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尤其是從兩種論述所處之位置或立場出發，更能發現歧異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試圖創造出一種我/他的差異，這時期的「我」，基本上是將「中國傳統」結合「俄式馬克思列寧主義」，亦即包含了中國傳統與「東方化的馬克思主義」，但由於這套論述的建立，仍多是在蘇聯的氛圍下建構而出的，或可以說，毛澤東或中共人士，仍是用「西方文化」在打擊另一套「西方文化」，即使毛不想照搬蘇聯經驗，但以當時中共的實力，仍舊得依附在蘇聯之下，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帶著民族主義的概念，但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主要的反抗對象，是以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為本，而非全盤的否定外來的思想，若是全盤否定，則中共能否將聲勢壯大的如此之快，亦有可議之處。

---

<sup>15</sup> 可參閱法農(Frantz Fanon)著，萬冰譯，*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譯林，2005)；以及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禪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公坊，2005)。

承接上段，也就是因為毛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底下仍未能夠達成搭理想中的社會發展模式，加以中蘇關係的日益摩擦，使他逐漸體認到這種情況似乎仍帶有被殖民的遺緒，或民族根本無以打破舊時代的牢籠，因此才陸陸續續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三面紅旗」乃至於文革等活動，力求保持民族的自主性，並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反之，鄧時期的論述建構，相當程度是結合了西方流行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發展概念，將馬列及毛思想上綱至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說，他看的比毛澤東還要實際，基本上能夠了解到當時的中共需要什麼、人民需要什麼，而不是一昧的排斥外來或秉持主觀主義，雖然他也試圖創造一種我/他的區別出來，但他更多的是從中國中心來看待問題，較之毛澤東則多以西方的立場與思維方式出發，鄧小平似乎更加能夠貼近中共的發展現實。

「中國特色」說穿了仍是一種未盡完成的口號，因此其包含了以中國主體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以及開放性的特質，兩者兼顧的混合情況。可以這樣理解，在憲法已確保中共永久執政地位的同時，「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實際上更是中共用來解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以及經由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以鞏固「中國特色」架構下的主體性價值。整個「中國特色」的建構，就是要抵抗改革開放後所招致對於中共內部的衝擊，不論是在統治合法性或是意識形態的建構；同時，更要能夠對於資本主義由外向內入侵的趨勢做有效的回應。因此，逐步發展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目前的局勢中，對於中共地位的穩固，具有相當重要的幫助。

這種「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由字面來解釋，很明顯的就是要與外國勢力的衝擊作區隔。但是這裡就出現了盲點，究竟外國的文化與中國文化是否毫無交融之處，或中國文化就是那樣的崇高無瑕？會出現這種論證，最主要就是中國內部有的論者會將「中國文化」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對於資本主義的片

面認識。<sup>16</sup>會出現這種觀點，就是其具備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甚至是殖民主義的影響，因而會對外部文化有如此的反感。

在鄧小平統領中共之初，雖然曾經有過民主之萌芽，<sup>17</sup>看似對於西方自由民主有某種程度的開放，亦給予許多崇尚自由民主之人士莫大的鼓勵與希望。也就是因為長期以來，受到壓抑的知識份子獲得似乎舒展的空間，便與雙百運動時的情形類似，對中共時政大放厥詞，以為中共能夠真正的往他們所想的「自由民主」前進，豈知對這些民主派人士而言，「北京之春」又只是曇花一現的幻象，只是對中共再一次的失望與失落。

特別是當鄧小平提出四項堅持之後，<sup>18</sup>讓原本對民主開放抱有希望的知識份子大失所望，尤其中共在八零年代期間，實施過三次反自由化運動，<sup>19</sup>當一些知名人士如魏京生等人被捕之後，這短暫出現的民主潮流遂快速在社會上消聲匿跡，轉而成為較為低調的活動。許多研究者認為，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堅持，實際上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穩固，以及保持中共的合法性與統治的正當性，這是一種工具論式的論述，在此筆者不去否定或爭辯這種論述的正確與否，而試圖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堅持」的意涵。

基本上，鄧小平的論述，與西風東漸有很大的關係，亦即，我們可以從民族

---

<sup>16</sup> 沈洪波，「文化全球化與中國國家文化安全」，*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4)，頁157。

<sup>17</sup> 民主之活動，例如1978年的北京之春，學生與知識份子除了要求四個現代化之外，還要求增加「政治的民主化」，一開始鄧小平表現出包容之態度，但當情況上升到危及中共領導的正當性與穩定時，則很快的就被壓制下來。請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頁916~917。

<sup>18</sup> 「四項堅持」，是鄧小平在1979年中共「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中國要發展四個現代化，則必須做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與馬列毛思想」才能夠成功，爾後並在1982年十二大憲法修改過程中寫入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請參閱，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158~184。

<sup>19</sup>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263~266。這三次反自由化的運動，分別為1981年批判軍隊作家白樺的劇本「苦戀」、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及1986年底的運動，此次運動並造成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及中宣部長朱厚澤的下台。

主義的角度去思考這「四項堅持」論述的建構。在改革開放初期，自由民主的風氣使得社會上瀰漫著不一樣的氣氛，對於力求改革的鄧小平而言，爭取知識份子的認同不啻為加強自己名聲的一項利器；不過，就整體民族的發展考量來說，又不能夠太過「自由民主」，以免到時各地區、各不同民族人士都藉由自由民主的口號要求更多的「福利」。此外，這種來自西方的風氣，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更難以完全見容於自稱奉行「馬列主義」的中共底下；再加上鄧小平長期以來倡導「獨立自主」，也因此更不能夠讓西方的流行文化牽著中國的鼻子走。

也就是說，鄧小平雖然與資本主義強權美國結交，但其仍不願意因此被影響。更有甚者，他希望維持中國的「獨特性」，保持中國的「主體性」，或是民族的「自主性」；在經濟開放的同時，文化及意識形態層面卻日益的緊縮，這是鄧小平自身的革命經驗告知其不能夠「搖擺於東西之間」，同時更要從「中國中心」出發來創造並實踐適合中國、適合民族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他不願意已經在經濟層面進行開放，又要接受來自知識界的改革要求，這對於鄧小平來說，是挑戰到他個人以及中共存續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問題，更是領導階層必須正視的問題。

實際上，類似的情況在鄧小平掌政期間一直存在著，鄧小平在經濟層面實施著與資本主義社會類似的政策與作為，甚至宣稱「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等讓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會為之搖頭的論述。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在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論述建構上，幾乎都充斥著民族主義的思維模式，這是因為，即使在人民的經濟活動層面上，已慢慢熟悉或接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洗禮，但在最根本的民族意識與人活動的指導方針上，仍必須維持中華民族的主體性，才不至於被資本主義所徹底影響，或是取而代之。也就因為如此，雖然十三大時，趙紫陽正式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做出報告，這項論述也寫入了中共的意識形態之中，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中共在宣稱「初階論」的同時，又進一步的進行與構築

「反和平演變」的活動與論述，<sup>20</sup>試圖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彰出來，並且藉此論證資本主義道路的窒礙與困難。<sup>21</sup>

「反和平演變」的提出，是另一個明顯的標誌我/他區別的證明。鄧小平與中共領導階層面對著經濟開放的現實，必須要能夠提出有效的方法，使中國人民對中共、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仍保持信心。因此，鄧勢必又得將這種現勢上升到民族認同的層次，以此將經濟開放所招致的「惡習」降至最低。這幾乎已成為中共面對外來潮流碰撞下，固定推出的回應模式。在此，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為何經歷了像文革這樣大的動亂，隨之而來的「自由民主浪潮」卻不能夠廣為流行，而只囿於知識界之中？

最流行的說法與原因是，人民已厭倦了翻天覆地式的政治運動，也不希望好不容易看似能夠平靜下來的生活，再度引起波動；不過，中共適時建構更貼近人民大眾的「新文化」，更是重要的因素。這種「新文化」建構的模式，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鄧小平 1978 年之後取得大權後陸續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初階論」以及「清除精神污染」<sup>22</sup>、「反和平演變」等論述有如出一徹的概念，不論是毛或鄧，他們都很清楚的掌握人民大眾的心理狀態，有

<sup>20</sup> 「反和平演變」，根據趙建民的觀點，中共在 89 民運之後，確認了「反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持續發展的障礙，甚至將八九民運也解釋為一次「流產的和平演變」；而之後的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亦是西方和平演變下的成果，中共為抵擋這股潮流，除了研究分析東歐與蘇聯的經驗之外，也提出了「堅持黨領導，反對反黨制；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軍隊參與政治；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議會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堅持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法則，反對私有制」的五項堅持與反對，而中共對於如何「反和平演變」的論述與政策產出，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五項堅持與反對來建構的。詳見，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1997)，頁 183~185。

<sup>21</sup> 李英明，「現階段中共反和平演變之研究」，載於張隆義主編，**和平演變的理論與實際**(台北：政大國關中心，1992)，頁 38。

<sup>22</sup> 「清除精神污染」，是 1983 年底中共藉由公開批判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會上的談話而發動的運動，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與生活方式在社會上流行的運動。基本上，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共領導階層，試圖將運動所造成的影響降至最低，以免造成大規模的動亂，但在日後，也就是因為胡耀邦的看似的消極抵抗資產階級自由化，導致他在 1987 年下台。請參閱，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 265~268；楊風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理論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 236~237；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1999)，頁 347。

效的製造人民能夠輕易了解與掌握的論述，以此與他們所面對到的難題做進一步的鬥爭與抗衡，厲害的是，這些策略往往都收到很大的成效。

當鄧小平與中共領導人在建構反西方的論述時，一方面要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尋優良之處作為回應，另一方面也希冀能夠混合出一套社會主義的文明：

「…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sup>23</sup>

這樣一種說法，要求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相當程度就是要以這樣的概念，塑造出一套新的、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文化規範，這不僅是一種對內的鞏固社會穩定的手法，對外，同樣也起到一種保護性的作用，使得中華民族，或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之上的人民，能夠有屬於中國自身的文明、文化可以追崇、可以信仰，而不必要也不需要太過倚賴外國的文化。

當然，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化，經過改革開放的衝擊之後，不可能是一種「純淨」(pure)的原原本本產生自中國的文化，它有很大的機會與可能性，是經過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機制，或說是可茲利用的某些文化互相的交雜，進而顯現出與呈現出的。基本上，這樣一種文化訴求，是通過中共黨的建構與認可的，並非是一種文化自然而然生成的過程，反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推力與壓力，可說是一種人為的、被刻意建構出的思想邏輯；也就是說，中共在經濟上進行改革的工作，接受較為開放的論調，但在內部統治上，或文化要求上，仍堅持一貫的作風，那就是維持所謂的中國主體性，避免西方勢力與文化透過改革開放大量

<sup>23</sup> 鄧小平，「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27~28。

的進入中國進而影響中國人的各方思維。

其實，當鄧小平全力消弭民主運動的風潮，卻又有限度的在經濟層面開放西方思想的進入，也透露出他更著重實際的特性。在毛澤東晚期，毛所強調的是階級鬥爭，將原本不那麼嚴重的問題，經過其大聲疾呼、或刻意的「創造」出來之後，以其理想性作為依靠，試圖將中國帶往幻想的美好境界之中；而鄧不同，鄧小平同樣面對到黨內保守派與開明派的雙重夾擊，姑且不論他個人的「偏好」，從實際作為層面來看，鄧小平在不同領域中施以不同的方法，創造出一種「混搭」式的中國風格，不是全面的開放，但也不是全面的緊縮，而是經過權衡考慮之後，再進行各項工作的鋪陳。雖然鄧晚期發生了六四運動，打擊到中共與其個人的聲譽，不過，鄧小平總能適時的挑起民族情緒，以避免外國勢力干政等藉口，持續的坐穩其領導人之大位。

### 第三節 專制或開明：「新權威主義」與「河殤」爭論

鄧小平統治期間，隨著改革開放的落實，一些類似於中共建政初期仍保有一些資產階級的情形所發生的問題也逐一出現，這是中共內部所認為的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論者以為這些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壞因子又再度趁隙進入了社會主義中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進與未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透過一些研討的機制與場合，一些學者提出了「硬政府，軟經濟」、希望中國出現類似戈巴契夫的強人政治等聲音，希冀由此作為來強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正當性，並藉此將改革開放所附帶產生的問題給予解決。最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在社會開放未臻完全的時候，必須強化國家權力，尤其是一般人民大眾還沒有「民主參政」的能力之時，勢必得犧牲掉一些民主法治，代之以社會的嚴密法治與經濟的秩序化，<sup>24</sup>以使整個國家進入一個「穩定發展」、不受到太多無謂「影

<sup>24</sup>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台北：淑馨，1992)，頁 448~449。

響」的階段，這就是「新權威主義」出現的基礎背景。

幾乎就在差不多的時間點之上，社會上還出現了另一個爭論，那就是連續劇「河殤」的播映與流傳。基本上，此連續劇或電視集(六集)是由中央電視台所編製與播放，內容主要探討的是中國文化的困境與可能之出路，這在當時進行改革開放將近十年的中國大陸內部，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不論是知識份子，或是鄉野農夫；或是高官顯要，或是販夫走卒，對於這一系列對中國文化走向的探討都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但也因為其內容牽涉到討論中華文化的走向，是該向西方開放，還是繼續的將傳統文化放置高位，因此，整部電視集啟發著社會大眾關於民族發展、民族走向等議題的思考，同時也引發了正反兩面的激烈討論。

基本上，在八零年代後期，中共內部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包括「新權威主義」、「河殤」爭論以及「球籍」爭論等議題，都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隨著改革開放而來，東西方激烈碰撞下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事實上，中共建政之後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中國所謂的「傳統文化」，已被由「毛澤東思想」領銜的「中國化之馬克思列寧主義」大軍所壓制，整個大中華民族的走向、發展都以毛思想為圭臬，奉行不悖。不過，等到文革結束、毛死亡，接班的華國鋒又不力之情況出現後，整個中共內部對於毛思想的發展與討論有了另一番新的詮釋。

毛的言論與思想體系與歷史角色，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概括的定位。他不再是那唯一高掛的紅太陽，而只是與其他領導階層共享智慧結晶的一位傑出領導人。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東西方的接觸日益增加，相對而言，接收到西方風氣的知識份子開始思索著中國未來應該的走向，是要完全倒向西方，或是在偏向西方中仍堅持自身的主體性，這些問題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熱烈的討論，這也就是東西方再度碰觸下包括一般大眾與國家領導人所要面對到的重要課題。

基本上，不管是保守派或開明派，其實都是秉持著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去分析事實狀況，以求取整體民族的穩定發展與永續的成功。但是，就在這樣的氛圍之中，產生了一些衝突的因子。在此，先擷取一段蘇曉康在「河殤」中的說法：

「從藍田人頭蓋骨到孔子，我們似乎還能問一句：中華民族為什麼偏偏選擇了儒家這樣的文化設計？這種文化無疑是世界整個文明的一份豐厚遺產，它不僅產生過無數天才、英雄，而且還把黃種的中華民族孕育成整個人類最為龐大的時空實體，鑄就了一種追求和諧安寧、講究理性秩序、重視人倫傳統但卻封閉、保守的人類心靈結構。然而，它在今天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潰了，這對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壞事還是好事呢？有人說，應該砸碎儒家學說，實行全盤西化；也有人說，中國只能西體中用才有出路；還有人說，必須重建儒家文明的第三繁榮期。近年來，無論是中國知識界對儒家命運的反思和文化戰略問題的大討論，還是在曲阜出現的隆重的祭孔活動，都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反省已經觸及到種族文化選擇這個最深刻的命題。」<sup>25</sup>

他在此段論述中，對於儒家傳統文化做出先褒後貶的評斷，不過，他既沒有全盤否定儒家傳統，也未要求中國社會往西方倒去；但是，從他的論述可以依稀看出，當時某些知識份子對於中共在經濟方面實行開放，但在文化思想上卻依然鎖國的心態確實有所不滿，認為此舉將會使整個中華民族陷入一個不良的情況之中。

雖然「河殤」沒有明確說明中國該往何處去，但由其製作是由中央電視台負責的背景來看，給予時人的印象是中央的改革派應當也是支持片中的論述，這更給予了開明派一個美好想像的空間。但也就是它看似否定了儒家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重要性，而呈現出一種崇尚海洋文明、崇尚西方的意味，因此給予另一派的民族主義者攻擊的空間與著力點，他們批評「河殤」否定了中華民族

---

<sup>25</sup> 蘇曉康、王魯湘著，**河殤**（台北：風雲時代，1988），頁5。

的傳統文化、以隱喻的方式透露中華民族的落後性、甚至於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不屑一提等等，<sup>26</sup>這是種種宣稱基於民族認同、民族大義出發的論述，但似乎也太過於牽強與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新權威主義」的出現，也是基於中國的改革未臻完全，仍需要國家(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強力領導與介入，甚至要有強人領導，才能夠使中國往社會主義的天堂前進等理由而發生的，但是，這樣的論述最後也沒有成真，不論在保守派或開明派之中，這樣的論述都未能起到很大的吸引力。<sup>27</sup>很重要的，八零年代所出現的這些爭議性話題，幾都圍繞在中國該往何處走的討論之上，也就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勢必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這些論爭背後，實際上都涵藏著民族主義的論述。以「新權威主義」為例，它試圖強調中國傳統、政治權威與強人領導，這似乎會讓人有種回到過去「封建社會」的感覺，但同時它也是從中國傳統出發，認為這樣的做法，才能夠使各項機能都還不夠成熟的中共，在面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挑戰底下，保持自身的穩定，而不受到外界太多的影響與介入。這是一個從民族獨立的立場出發的論述，它雖然看似封建，但實際上也要求領導階層藉由這種方式將中國帶向現代化的機制之下，形成一種類似於當時的亞洲四小龍的體制，因此，開明派對其的批評，包括會讓中國往後倒退至封建等話語，似乎也不太公道。

更有趣的一點在於，這些論述基本上，都是由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提出的，他們有感於毛澤東後期至文革這段荒誕的歲月，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政治、文化與經濟不同調的情況，希望藉由這些不同意見的討論互動，為中國找出最有效的藥方。也因為這樣的情況，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亦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有些

---

<sup>26</sup> 李谷城著，*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298。

<sup>27</sup> 李英明，*文化意識形態的危機—蘇聯、東歐、中共的轉變*(台北：時報，1992)，頁 154。

是全盤否定，有些則試圖重返，有些則是抱持著疑問，懸而未決。不可否認的，他們所提出的論點與論述，都是他們所認為對中國「最好的」、或「最可行的」，這都是改革開放底下，民族主義對他們這些個體的激發，使這些知識份子希冀能夠藉此引領中國往前邁進。

這些知識界的討論，隱藏著關於我/他之間差異性的討論，也標幟著這些論者試圖擺脫西方制約與中國傳統文化束縛所要追求的未來。基本上，他們仍想要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中華傳統的道路，也可以說他們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但實際上都有個相同的做法，那就是企圖調和東西之間的優良文化，以此作為整個中國未來走向的基準與依據，只是他們所認定的「優良文化」可能有所不同。通盤來講，這些知識份子乃至於個別在背後支持的領導階層，實際上都是從「中國」的發展作為前提來建構這些論述，他們雖然各有不同的主張，但卻都將他們個別的論述連結著民族主義，期盼能夠獲得人民大眾的共鳴來使得自身的主張得到重視。

基本上，這些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討論，該開放或緊縮文化的接觸等論爭，都將「傳統文化」或「中國傳統」重新擺上、置入談判的空間。中國傳統文化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有將近兩千年的悠久歷史；期間雖然亦曾遭遇過法、道等家的挑戰，但儒家總能順應時勢，適時的做出理論的調整，例如宋明理學。但時至明清，不但人才考試晉用制度過於僵化，儒學潮流也轉至訓詁、考據等僵化的、未能跟的上時代的分支，因此至清末民初，一些受過西方思維影響的知識份子開始試圖改革儒家長期以來獨大所造成的弊病，但也因為知識份子的歧見太多，有人仍抓著「傳統」不放，仍以「文化中心主義」做為民族認同的依據，使得清末的改革成效並不能有效的彰顯。<sup>28</sup>

---

<sup>28</sup> 鄭師渠，「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研究*，第5期(1995)，頁90~92。

另外，到了五四運動期間，由於民國初年政局的紊亂，西方的議會政治一時之間還未能夠穩固實行於中國，也就是政治上的革命似乎沒辦法改變中國沉積已久的弊病，也因此，包括陳獨秀、胡適等人採取了文化革新的手法，但也就是那時候的國難當頭，使得馬克思主義式的民族主義，一種階級差別論式的民族主義傳進中國，<sup>29</sup>並在日後造成極大的迴響。另外，五四期間的民族主義，更是一種反民族文化的民族主義，強調的是拋棄過往的舊禮俗、文化，並嚮往民主與科學，<sup>30</sup>這在當時的知識文化圈中，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等到了毛澤東等人浮出檯面，實際參與中共的活動之後，他們也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中國文化的意義與功用。就如前述，毛澤東強調的是結合傳統文化中有利於革命的部分、或是優良的部分，配合馬克思主義，希望以此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化」，當然，最終他確實做出了一項成績，那就是把「毛澤東思想」劃入中國人民的家園、人心之中，與傳統人倫道德的地位並駕齊驅甚至超前。不過這一套新的文化，幾乎將中國的過往傳統都加以排除，尤其是經歷了文革期間的大破壞，人倫悲劇不斷上演，基本的道德價值已被「毛澤東思想」所壓制與超越。

鄧小平的上台，除了平反文革期間受迫害人士的名譽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將「毛思想」也劃入中共意識形態的「廟堂」之中，成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的「樣板」，是拿來尊崇用的、毛思想的重要性與實用性也因此被「象徵性」的高昇，但實際上卻是束之高閣，難以有所作為，儘管中共的所作所為，仍多宣稱是依照馬列毛主義與思想而來的。鄧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與政治文化間之摩擦，也因此，他適時的將「中國傳統」與「傳統文化」再度搬上檯面，以這樣的立場塑造人民大眾的民族認同感，藉此來抵禦外國文化力量的入侵。

---

<sup>29</sup> 李良玉，「從辛亥到五四：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頁353~354。

<sup>30</sup> 孫國棟，「民族主義與民族文化」，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頁183。

當然，鄧所掌握的「傳統文化」亦不是「正統的」，或我們可以這樣說，自從孔子去世之後，所有由他延伸而出的所謂「儒家正統」、「傳統文化」就是參雜著許許多多不同的思想邏輯，孔子最初的那套理想、他的論述，也都有意無意的被各時代的領導階層所使用與改變，而這些，都是各個時代、各個社會為了生產適合其現實的「文化」所做的行為，也都包含了「複製」與「創新」兩項工作。

要說在共產主義國家內，任何足以被拿出來討論的思想潮流不是受到國家控制的，恐怕沒有人會相信。因此，包括「新權威主義」、「河殤」電視劇等的論辯，其實也都隱藏著中共內部權力傾軋的影子。不過，不可否認的，這些不同立場的討論、不同立場的思維，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點，那就是如何讓中國發展得更加迅速、更加美好，也就是都仍以「發展」為基礎，只是個別的方法與實踐模式有所不同。

此外，這些不同的論述，除了都是以「發展」為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們皆試圖塑造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以此激勵人心，或刺激人心，甚至鼓動人心，以期能夠獲得支持。「中國文化」在這些論爭中，又再度被提及與討論，各個派別有各自不同的見解，但實際上，就連飽受批評、說其拋棄中國傳統、崇洋媚外的「河殤」電視劇，也並非要完全丟棄傳統文化，會有這樣偏激的見解，應是他者有心與刻意的解讀。

而不同的主張與論述，事實上也都隱含著不同的理想性存在其中。「新權威主義」認為國家或黨適時的介入會帶給中國較為正常的發展；「河殤」的作者們則是從更為開放的角度，希望中國能夠吸收更多元的豐富文化，以適應越來越多的國際接觸所造成的問題。也就是說，不同觀點的主張，都有其論述的依據與根基，何種方法或論述，是適合中國的發展態勢的，基本上是很難界定，但也不能夠就因此互相排斥或攻訐，而應當試圖從中互相協調，互相融合，才能夠在爭議

減少之下穩定的進行發展的工作。

其實，文化本就是一個民族、國家，經由長時間的發展過程，逐漸歸結出的「產物」；它不可能是靜態不動的，而是會隨著時間、環境、社會發展等各項因素影響而有所改變的。毛澤東時期的誤處，就在於他最後把「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喪失了「文化」的「能動性」，企圖以毛思想當作人民的生活準則，在某些層面上，毛是成功的達到這個目標，但在深層的人心之中，他是否成功，則特別值得商榷。

鄧小平則不同於毛澤東，他不再強求建立一套位居一尊的「鄧小平理論」來與毛思想較勁，而以更為務實的態度來面對中國的發展問題，對於東西文化碰觸所帶來的問題，他則時抓時放(當然，若是會影響中共永續執政的問題，他決不寬待)；不過，中國文化在這段期間中，確實有較多的抒發與前進的空間，東西之間的交流也更加頻繁與流暢，在此同時，他企圖創造一套從中國中心來看待世界發展的論述，因此有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的產物出現，與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比，鄧不再將視角放在馬克思主義或這些亦是來自於西方的論述，而把重點放在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一套屬於中國、適合中國的意識形態論述，以使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能堅持獨立自主，保持中國的獨立性。

#### 第四節 小結

在鄧小平掌政的時期之中，打破了以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或「復興儒學」的論爭，中共將這些概念都歸類至「脫離中國現實」的區塊；基本上，鄧小平時期，中共是徜徉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再是獨居一尊，或像文革一樣被棄之不顧，反而是結合中國各不同時期的經驗，試圖將「優良的」傳統文化，有效發揮，此乃「古為今用」；另，更

要求結合他國的優良文化，與中國文化做有機的結合，此乃「洋為中用」。<sup>31</sup>鄧試圖將文化再次做一個創新的工作，這與毛澤東的作為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兩者間仍有意義與程度上的差別。這種不同點在於，毛澤東雖然也是希望截長補短，將「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做創新的工作，因此他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西方非資本主義概念的思潮邏輯，將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概念，例如「實事求是」，<sup>32</sup>做有效的結合工作。但很重要的，毛澤東雖然接受過傳統教育的洗禮，也宣稱其酷愛中華文化，不過中國傳統文化對其而言，卻又可以在某些時刻加以大力的排除，雖然他或許是從理想中國的發展角度出發，但也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很大的災害。

再者，毛澤東所創新出的「文化」，似乎並不那麼包羅萬象或真正的「與時俱進」。原因在於毛澤東自從在七大被劉少奇拱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之後，好像真的將他個人的思想邏輯視為中國的「唯一」，將之上綱到中國的「馬列主義」，甚至進入學校之中成為學生必修之課。這成為了一種教條，也限制了多采多姿的文化發展性。當時間來到了文革期間，這樣的狀況更是嚴重，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文化，這是一種等同關係，甚至已經到了神話的地步。

鄧同時也是宣稱要「創新」中國文化的一員，但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他不再拘泥於將中共的政策或論述歸於其一身，亦即，他試圖將毛後期的造神運動打破，試圖將神話打破，並且將毛澤東的思想論述區分成「毛澤東思想」與「毛澤

<sup>31</sup>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共產黨**，頁 142。

<sup>32</sup> 「實事求是」一辭，源於東漢史學家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其意是指嚴謹好學、力求事物真諦的一種過程，毛澤東將其意義轉變，「實事」為客觀存在的事物，「求」為研究，「是」為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亦即，「實事求是」的新意為「從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找出固有的非臆測性的規律性，做為行動的指導方針。」，請參閱，李秀華，「毛澤東：以中國民族文化形式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範」，**蘭台世界**，第 19 期(2007 年 10 月)，頁 57。

東的思想」，<sup>33</sup>將原來屬於「個人的」智慧，改造成屬於全黨領導階層的「共同」智慧結晶。由鄧小平在與華國鋒等「凡是派」進行鬥爭的作為，即可看出他手法之高超，他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打敗了高舉毛澤東旗幟的華國鋒，用毛澤東擊敗了毛澤東，這是他清楚了解到中國在那個時代、那種狀況底下適合怎麼樣的發展模式，適時的、有效的提出相關的論述，使得死命緊抱毛的「凡是派」一時無法招架，終致落敗。

鄧小平基本上較之毛澤東，則更加著重實際；毛澤東的許多作為，包括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推行，都可從他個人的理想性格、浪漫主義式的思維去建構與討論。但鄧小平不然，鄧小平面對的是與毛澤東不一樣的歷史環境，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種革命的角度；鄧小平則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sup>34</sup>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論證，也看的出鄧更加著重「實際」與「發展」的重要性。

另外，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鄧小平執政期間，與毛澤東統治時期有個類似的地位，那就是民族主義的地位，以及使用民族主義的方式。基本上，毛澤東時期，尤其到了後期、文革十年間，民族主義是一種維繫著毛、中共領導人與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載體，特別是當毛宣稱要將革命經驗散播至第三世界的兄弟之中時，這樣一種「世界革命中心」的樣貌，透過媒體與政策的宣傳，帶給當時民眾極大的信心；而鄧小平時期，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東西碰撞所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與要求自由民主的聲浪，他同樣藉由民族主義這樣一個載體，調和中共領導階層與廣大民眾的關係，亦即，包括三大反自由化運動、以及提出「四項堅持」等作為，都是鄧試圖從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出發，用以降低西方潮流所帶

<sup>33</sup>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在「關於建政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區隔出其中之不同。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中共長期以來領導人的集體智慧結晶，是中共意識形態中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共實踐所得出的論證，而毛澤東的思想，則相當程度代表了毛澤東在1957年後一系列錯誤的施政方針與理論建構，是屬於毛澤東個人的產物。

<sup>34</sup> 林建公、谷瑞扎著，**鄧小平的實踐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400。

來的影響。

不論是毛澤東或是鄧小平，在他們統治的期間內，都設法創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與新的意識形態，以配合整個中國所面臨的發展現勢。毛澤東創造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邏輯，宣稱凡事都必須將理論與實際結合，才能得到好結果，但基本上，此項論述仍是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論述修改的依據，西方還是制約著毛澤東，毛試圖製造不同於馬列傳統的獨特論述，卻在有意無意間仍被制約住；鄧小平理論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設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看到了毛時期身陷外來思維太久，以致於必須強力的衝破藩籬，卻也造成文革的失敗，因此鄧力主從中國出發，更為實際的藉由發展生產力，提高中國的經濟競爭力，讓中國能夠從文革的衰敗中逆轉成長。

不過，鄧小平雖然力求一套屬於中國自身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述，但實際而言，他仍然受制於馬列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思想。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鄧小平仍需要抓著這樣一系列的思想脈落，來維護中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他雖然已經為毛澤東做出了評價，但在施政、在論述的建構之上，仍受到了馬列毛有形無形的影響，也因此他的許多概念，實是重新發揚、重新高舉馬列毛的一些論述，將之再一次的引入現實的舞台之中，實際上，他仍然受到許多中共長期發展以來的「傳統」所限制，因此在文化層面、在政治層面等不同於經濟的面向中，他依舊持著一種緊縮的態度、甚至是一種壓制的態度，試圖不讓人民大眾有太多的發聲機會。

亦即，鄧小平雖然也在建構一套「新傳統」或「新文化」，但他的這套論述，基本上在建政前或建政初期的毛與中共之中，就好像已經存在著；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調，也似乎可以包含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框架之中，雖然其概念經上述的說明，兩者間確有不同之處，

但仔細深究的話，則又可發現他們的類似點仍舊存在。另外，鄧小平承接式的將民族主義的策略應用至國家政策之中，也與毛澤東時代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中華民族長久以來的自尊心與自信，確實也成為自毛以來乃至於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重要的施政媒介、重要的論述依據。

當然，鄧小平的種種論述與政策，民族主義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民族主義事實上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一種具備「差異性」的概念，它的力量不容忽視，但同樣的，它也是充滿危險的因子。<sup>35</sup>鄧小平藉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階論」等充滿「中國」意味的論述進行保護工作時，在另一方面，他可能就喪失了與他者間更多的交流與互動機會。也許，鄧小平就是認為太多的互動，可能會加速中國主體性與獨特性的流失，甚而危及到中共的政權，但也可能就是因為太多的民族式束縛，才使得「中國」或「中國人」雖然藉由改革開放獲得許多成功，但卻依舊將過往受到的欺壓與凌辱掛在心頭，擺脫不了被殖民或被壓抑的心態。

---

<sup>35</sup> 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著，張君政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2005)，頁 408~409。